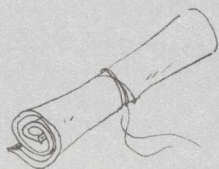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
——朱熹思想研究

王 健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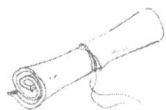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陈少明 ● 主编



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 ——朱熹思想研究

王 健 ● 著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朱熹思想研究 / 王健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5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617-5117-6

I. 在… II. 王… III. 朱熹(1130~1200) — 哲学思想 — 研究 IV. B24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152810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 刘小枫 陈少明

特约编辑 / 欧雪勤

封面设计 / 许尤佳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
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中国传统 经典与解释

在现实真实与价值真实之间

——朱熹思想研究

王 健 著

统 筹	储德天
责任编辑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李 瑾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电 话	021-62450163 转各部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www.hdsdbook.com.cn
市 场 部	传真 021-62869887 021-62602316
邮购零售	电话 021-62869887 021-54340188

印 刷 者	上海华成印刷装帧有限公司
开 本	890 x 1240 1/32
插 页	2
印 张	13.75
字 数	285 千字
版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7 年 5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17-5117-6 / B·290
定 价	29.80 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缘 起

晚清以降，华夏道术分崩离析，乃我国教育界和学界所面临的基本局面——晚近十余年“奋不顾身”的现代化使得华夏学术的如此局面更为彻底。整治大学文科、重新铺展学术的基本格局，已然成为深化改革开放的重大学术课题乃至新时代的艰巨使命——太平盛世必有文治。

问题是，如何整治和重新铺展？

现代西学入华以来，我们要么不断竞相追逐西方“显学”（种种现代学说），要么与西方“魔怪”搏斗。令人深省的是：即便发扬自家传统的种种当代儒学论说，几乎无不依傍西方的种种现代论说——从康德哲学出发批判性地抑或旁衍发皇地重新解释儒家传统，或者依照韦伯的社会理论重新解释儒家精神，一度被看作最精彩的儒学“新解”，与西方学术近两百年来用种种现代“学说”瓦解自家的古典传统别无二致——如今，这一局面因与西方后现代学术接轨而变得更为让人触目惊心！

与西方学人一样,现代之后的中国学人不得不在两条道路、两种“命运”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要么盲目跟从种种“后现代主义”,以比现代精神更为彻底的解构方式破碎传统;要么切实回归古典学问——倘若选择后者,则首先必须质疑并革除我们自“五四”以来所养成的凡事以现代来衡量古典的新传统。

如何重新获得已然丢失的古典传统,关系到中国学术未来的基本取向。我国现代学术的视域建立在现代西学的基础之上,由于对西学古典传统缺乏深入细致的理解,数代中国学人虽不乏开创华夏学术新气象的心愿和意气,却缺乏现代之后的学术底气和见识根底。因此,积极开拓对西学古典传统的深入理解,当是未来学术的基本方略——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重读自家的历代经典才会有坦荡、充实的学术底气,从而展开广阔、深邃的学术新气象。

晚近西方学界方兴未艾的“古典政治哲学”表明,西方学界的有识之士已然踏上了回归古典学问之路。不消说,这种学问取向虽然是古典的,其生存感觉却是现代之后的。“古典政治哲学”绝非一种学说,或某种“主义式的”政治哲学,换言之,不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的任何“显学”一类的东西,更非一种所谓“新的方法论”,而是一种学问方向:悉心识读经典大书——如果非要冠以学科的名称,则可以叫做古典解经学。这种学问方向基于古典的心性:既然是一种心性,古典解经学唤起或寻找的便只会是心性相同的学人,并激励这些人自觉杜绝种种“盲目而热烈”的“后”学或“新”说(尼采语),挽回被现代文教体系的学科划分搞得支离破碎的学问大体,进而在我们的大学中寻回自身的地盘——在近三百年来西方、近百年来的中国,古典心性流离失所,已然丧失了自己的家园——学堂。

继“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系列我们推出“中国传统:经典与

解释”系列,首先要表明的是: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收拾我们自家的传统经典,乃中国学术新气象的根底所在;其次要表明:我们志在承接清代学人的学术统绪,进一步推进清代学人的积累——清代学术的不朽成就在于整理历代经典,如今我们能否取得世纪性的学术成就,端赖于我们是否能够在现代之后的学术语境中重新拥有自己古传的历代经典。中国古代学术以经典的研究和解释为核心,历代硕儒“囊括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的学术抱负和“皓首穷经”的敬业精神,在今天需要我们从自身的语境出发重新发扬光大。

本系列不拘形式——或点校、注释尚为善本的古书,或重新识读(疏解)历代典籍,或汇集民国时期以来的研究成果以研究文集的方式追踪某个专题……,唯一谢绝的是中西比较之论或种种现代一后现代“主义”解释学的高论。

古人云:“有志者事竟成焉”。

刘小枫 陈少明

2005年10月于中山大学哲学系

序 言

写作朱熹，还是博士论文的选题。当时的立意，是有感于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困惑，故而致思成“一包热情”的道德理想主义。时隔十多年，不仅初时立意全无，而且谋篇行文全废。这就是说，完全写出了另外一个模样。这好比本想琢磨为一高华的玉卮，结果却埏埴了一寻常的陶罐。

其实，把朱熹设思为一纯粹的道德理想主义者，在书稿初结之日，心中就颇有不安，但那毕竟是我当时的心愿。然而，似有神差鬼使，书稿不达而还，像是冥冥之中要我重新开始。于是，我索性定下心来。

朱熹的一生，呈现出一种丰富的却又是奇异的样态：他始终艰难地用力贯通着两个世界，即极高水准的形上学理与极为复杂的政治现实。可以说，“著书俟来哲，补过希前修”与“经济夙所尚，隐沦非素期”，是他对自己真切的概括。正是由于这种样态，给我在如何定义朱熹思想时带来了困难，那就是说，我找不到令自己信服

的切入点。而且我发现,那些互为矛盾的观点,却是来自这鲜明的形上与形下的世界的。于此论述,较为典型者是牟宗三和余英时两位先生。牟氏从道德形而上学立意,评价朱熹的“头脑是逻辑的、分析的。动就是动,静就是静,动没有静,静没有动”,因此合乎同一律,从而落在物理的层次上。余氏则从历史现场形而下着眼,指出朱熹及所有理学家所构建的形而上系统“是为秩序重建这一终极目的服务的”,即提供“超越而永恒的保证”,因此,“形上世界虽然重要,但在整个理学系统中却只能居于第二序的位置;第一序的身份则非秩序重建莫属。”

牟宗三先生强烈地关怀中国民族精神在现时代的新铸,价值立意极为鲜明。朱熹是被他作为新铸道德精神的资源而不是独立的研究文本,因此疏于整体性地把握朱熹的理论体系和思路网络就在所难免。设使认真理解朱熹“仁说”和“太极”思想,那个“逻辑的、分析的”,“落在物理层次上”的结论便站立不住了。朱熹所言“仁便有个动而善之意”,“那个满山青黄碧绿,无非这太极”,如何也挂搭不上这样的结语:“只存有而不活动”,“朱夫子讲性、理、太极,只成一个泛存有论的概念。”

余英时先生极切近中国儒家的真精神。然而,我们尚需知晓朱熹及理学家们为实现重建秩序这一“终极目的”,是依据怎样的价值理念,他们理想中的社会秩序又是什么样的形态。为此,仅简单地说出形而上系统提供“超越而永恒的保证”就不够了。我们还必须循着历史现场的“分殊”去深入解读形而上本体的“理一”,以及“理一”落入社会的“历史事件”。

那么,当如何理解这样两极的世界在朱熹这里的关联呢?杜维明先生说,朱熹是传统儒家中的—个杰出的士,也就是现在我们通称的“公共知识分子”。于此,我大有同感。朱熹一生从政的时间不多,而且主要在地方。但无论“寒泉著述”,或是“武夷讲学”,

他几乎从未停止过对朝局和时政的关心。是否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取决于对时代、社会、历史之“问题”把握的准确度,以及运用自身学理资源对“问题”透视的深刻度,并为解决“问题”提供有益的路向,亦即敢于肩负批判与建设的双重责任。

批判当对问题,建设需要学理。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可以援引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观点作证明。柯氏坚决反对语言分析的过度使用,从而导致哲学陷入“只问方法,不问意义”的困局。他告之,作为读者,理解哲学家就是要理解他所提出的问题,因为他的理论就是对这个问题的系统回答;作为哲学家,他的命题“为真为假,有意义或无意义,完全取决于它所要回答的是什么问题”。

在今天,所谓“问题”或“问题意识”说得够泛了,几乎成为学术时尚语言,似乎不说便不能深刻。这固然是好事,因为只有面对共同关心的“问题”,才会有对话的可能。然而,关键在于提炼和形成“问题”的能力,以及所提出“问题”的质量如何。

作为哲学家和思想家而言,真正的有质量的“问题”,应该涵盖两个层面。一是来自具体的历史境遇,时代的问题正是他真实的生命感受;二是在他所提炼出的具体的问题中,又内涵着人类生存的普遍性的矛盾,而具有永恒价值。因其有永恒性,后来的人们才会在一种“历史的相似性”中与哲学家的“问题”发生关联,而哲学家的思想才能成为现代人的文化生命资源。

那么朱熹呢?北宋中期,儒学的主题转入“内圣之学”或“为己之学”;宋儒的中心思想是“明体达用”之学,这已是当今儒学学术圈的共识。但这还是泛化的思想史的描述。需要深入追问的是,朱熹是以怎样独到的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路去求解这个时代性的课题呢?就其价值关怀来说,朱熹毕生所要解决的是,如何使“内圣”或“为己”之学具有普遍的适用性,从而构建合理的社会生存环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人人得其本心,以制万事,无一不合宜者”。

在这样的价值关怀下,我们应注意朱熹理论学术的两重维度。一重是基础理论的建构。为了解决“为己之学”在个人如何可能的问题,他与湖湘学的论辩,着力论证了“先天性善”的基本哲学命题,并奠定了“先涵养、后察识”的道德实践理性的基调。同时他所论证的“格物穷理”之说又为人们提供了一条最为可行的实践路径。陆九渊和朱熹所进行的所谓“尊德性与道问学”的争论,实质上已是朱熹理论体系中的应有之义。另一重是文化功能的。朱熹的努力方向可以概括为以“学统”(借用现代语言,即所谓理论学术)建“道统”,用“道统”制(约)“政统”(或曰限制“君统”)。

基于这样的功能思考,朱熹一生有两个尖锐的批判对象。一是以“正心诚意”批评皇帝,所谓“格君心之非”;二是指向自己的队伍,即对儒家学者圈的批判,他甚至认为宋代社会的危机实质上是文化的危机,而儒家学者没有担负起文化责任:“秦汉以来,道不明于天下,而士不知所以为学”,故而“天理不明而人欲炽,道学不传而异端起”。在他看来,更为危险的是学者队伍自身的弱化:“而世之学者,稍有才气,便不肯低心下意,做儒家事业,圣学功夫。观有此一种道理,不要十分是当,不碍诸般作为,便可立下大功名,取大富贵。于是心以为利,争欲慕而为之,然又不可全然不顾义理,便于此等去处,指其须臾之间偶未泯灭底道理,以为只此便可与尧舜三代比隆。”在朱熹的语境中,学者的角色和责任就是思想的建设 and 精神的战斗,因此,他才极为自信地指出:“若此学不明,天下绝无可为之理!”

正是因为朱熹的“问题”有着时代和普适的双重性,才使他成为犹如罗素所说的“既是结果又是原因的幸运的哲学家”。这只是就大跨度的历史而言。作为影响中国传统社会后半期的思想家,朱熹集经典儒家和北宋理学之大成,汇纳群流,归之一趋,构建了体系完备的新儒学,他是“结果”;而就其历史文化的作用而言,他

是“原因”。然而在南宋具体的历史境况中，朱熹的文化理念却被复杂的政治现实弄得“七折八扣”。不仅当权者不理解这份“道学苦心”，就连世人也常报以冷漠。绍熙五年（1194），朱熹 65 岁，出潭州任，入侍经筵，受挫归闽，老诗友徐安国作《满江红》感叹举世不识“晦庵心”的悲怀：“追往驾，烟宵里。终旧学，今无计。叹白头犹记，壮年标致。一乐堂深文益著，风雩亭在词难继。问有谁、熟识晦庵心，南轩意？”

其实，朱熹的不幸也来自现代历史的误解。也许，这正是现代人的悲哀。

依我来看，朱熹是一座文化精神的殿堂。设若步入其中，定会释然困惑之荷负，当能掂起明哲之宝什。但是，当我们欲躬身前行时，新的疑问又接踵而来了。因此，这本小书只是求索的初步。因为，朱熹是道不尽的。尝如人言：说不完的康德。原来，那结论竟是一样的。

丙戌立秋日（2006 年 8 月 7 日）

目 录

序 言 /1

第一章 以学统建道统 以道统制政统 /1

第一节 历史的无奈选择：道统与道学的分离 /3

第二节 “士不知所以为学”：儒者的文化缺席 /12

第三节 秩序认同与价值紧张 /15

第二章 “问题”的形成 /67

第一节 哲学家的“幸运”：与时代问题的“对接” /67

第二节 从“格物之义”到“全体大用”：“问题”的初步确立 /78

第三节 “就里面体认”心学之路的受挫 /106

——兼论《牧斋记》

第三章 “理一分殊”难题：李侗到朱熹思想理脉的解读 /118

第一节 历史意识与终极价值的贯通 /120

第二节 李侗影响朱熹的两个要点 /126

——以《中庸》为文本

第三节 “难在分殊”：理性自由之精神主体的艰难获得 /136

第四节 “天德之效”(“致中和”)如何可能? /160

——李侗留下的“困学”

第四章 走出“恐闻”与“困学” /167

——道德实践理性基则的确立

第一节 “一试大儒之效”的致用践履 /168

——兼论《壬午应诏封事》与《癸未垂拱奏劄》

第二节 走出“困学”：“中和”理论的探索 /189

第三节 “中和新说”的最终形成 /205

第五章 “心之德”与“爱之理” /242

——“仁学”系统的完成

第一节 “心”之精神主体的四个要点：解读《答张敬夫》(四十九书) /242

第二节 “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的人性论基则：《知言疑义》解读 /252

第三节 “理一”之价值本体的最终建立 /272

——《仁说》解读

第六章 综论哲学与历史的“太极”理论 /340

——“全体大用”整体之学的完成

第一节 太极理本论 /345

- 第二节 “气强理弱”与“理强气弱”：“太极”思想中的历史
理性 /372
- 第三节 “体用一源，显微无间”与“理”之人文价值 /388
- 第四节 “道统”制“君统”如何可能：朱陆“无极太极”之争的
本质 /391
- 第五节 作为范导历史方向的道义原则 /404
——朱熹和陈亮的历史与道统之辩

第一章 以学统建道统 以道统制政统

关于朱熹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两个评价是被普遍认可的。一是学术史的,其一生讲论、著述、撰注、编辑等,成就之丰富,领域之广泛,思想之深邃,被益为“至文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宋元学案·晦翁学案》)二是思想史的,称其与孔子先后耸立,为中国近古里程碑式的思想家和哲学家。如钱穆先生所说:“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自有朱子,而后孔子以下之儒学,乃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直迄于今。”(《朱子学提纲》页1,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6年)

对于这些平面而静态的结论,我们是充分认同的。然而,更需要深入追问的是:作为孔子之后儒学的里程碑,朱子的思想在现代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生活中,能否继续“重获新生机,发挥新精神”?如果我们希望得到肯定的回答,那么就必须“知人论事”,尽可能地

回到朱熹生活其间的“历史现场”，在他的政治社会实践以及思想学术活动中，去把握其毕生所苦心求索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或哲学家，他所关注的“问题”必然扭结着丰富的历史和文化要素。解读这个关键点，才可能立体而生动地理解朱熹的精神和人格世界，发现他“直迄于今”的文化价值和思想意义。

笔者非常认同英国历史哲学家柯林武德的“问答哲学”或“问答逻辑”。柯林武德反对实在主义者把对客观实在的研究转化为语言学的问题，以至于在语言分析的过度使用中，把哲学引入“只问方法，不问意义”的地步。柯林武德的观点在两个层面上极有参考价值。其一，他认为一种系统的哲学理论就是哲学家对自己所提出某种问题的解答，“凡是不理解所提出的问题究竟是什么的人，也就不可能希望他理解这种哲学理论究竟是什么。”其二，一位思想家或他所提出的命题，在现实以及历史的过程当中，“为真为假，有意义或无意义，完全取决于它所要回答的是什么问题。脱离了一个命题所要回答的特定问题，则命题本身并无所谓真假或有意义无意义。故此，重要之点就在于我们必须明确找出它所要回答的问题”。柯林武德将这种“提问题的能力”，称为“逻辑的功效”（efficiency）。（参见何兆武：《历史与历史学》页117—119，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柯林武德的观点虽然是西方知识学的背景，但对于我们解读朱熹却有着重要的方法论价值。也就是说，以朱熹的“问题”为切入点或研析思路的原点，方有可能真正理解他的精神世界，并发现其思想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意义。因为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思想体系，在新的时代能否延续它的生命力，继续成为新的精神资源，主要取决于它所提“问题”的质量，即这一“问题”是否具有“历史的相似性”，以及对于人类命运中那些根本性的、永恒性的问题的思考深度。有了“历史的相似性”，历史上的思想家对于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才会发生关联；有了永恒性的思考维度，我们现

代人对于传统也才有接轨继武的必要。

那么,什么是朱熹的“问题”?他的“问题”质量又如何?这些“问题”是怎样形成的?朱熹又是怎样解决和回答这些“问题”的?

第一节 历史的无奈选择:道统与道学的分离

如果回到朱熹生活其间的“历史现场”来研析这些设问,就会发现这绝不能简单地在理论思辨层面上来回答。作为思想家或哲学家的朱熹,知识与智慧是他生命存在的根本支撑,因此他必须依靠学术和思想的深入探索来搭建自己的精神世界,以便按照明晰的哲学信念去生活。另一方面,作为传统儒家中的“一个杰出的士,也就是现在我们通称的‘公共知识分子’”,(杜维明语,见朱杰人主编《迈入21世纪的朱子学》序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朱熹又是社会政治生活的实践者或干预者。终其一生,朱熹从政的时间总量并不多,黄榦在《朱先生行状》中说:“仕于外者仅九考”,但是从思想取向上看,朱熹在有生之年,从未间断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干预和关注。哲学家与公共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使得朱熹的精神世界呈现出一种丰富而奇异的样态:极高水准的形上学理系统与极为切近的现实关怀的艰难结合。这种精神结构必然逻辑地深化出这样的问题:如何形成既具有终极依据又能有效地整合社会、规导政治的价值理念?又怎样将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理念贯彻到社会政治的具体操作中去?对于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有效结合模式,儒家将其表述为“明体达用”。可以这样说,朱熹一生所苦心求解的,也正是由他的精神世界和人格结构所导出的“体用”问题。淳熙十年(1183),朱熹54岁。此时的朱子,思想学术臻于淳熟,政治社会见地也达到深锐透彻的境地。这一年,他在为弟子廖子晦所作的《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对自己所思所虑的“问